

September 2014

The System of the Press and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Jun Zh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Zhang, Jun. 2014. "The System of the Press and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5): pp.171-17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5/24>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报刊体制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

张 均

摘 要:报刊体制介入中国当代文学(1949—1976)发生、发展的方式,目前学界尚无有力研究。而事实上,它在三个大略递进的层面上深深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存在状态:先是报刊社会主义所有制将新/旧文学、左/右文学之间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格局逆转为“新的人民的文艺”一统文坛的失衡状态,然而报刊“代理人困境”的存在又使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内部充斥着不同话语成分和文学利益的竞争,但派系主义报刊运作规则对意识形态模式的“喜好”最终使这些内部竞争消失于无形。当代文学由此呈现为逐渐板结、衰落的过程。

关键词:当代文学; 报刊体制; 社会主义所有制; 代理人困境; 派系主义

作者简介:张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电子邮箱:yugong01@126.com

Title: The System of the Press and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way the system of the press intervenes i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49–1976) requires convincing research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 In fact, the system of the press affects the existenc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he three progressive aspects. Initially, the socialist ownership of the press turns the old-new and left-right dichotomies into the imbalanced state dominated by “the literature for the new people.” Then, the agency dilemma of the press leads to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literary discourses and interests in the internal integr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inally, the operation principles of the sectionalist press system favor the modes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nullify the internal competitions. These effects eventually accumulate and lead to the gradual fossilization and declin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Key word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press system; socialist ownership; agency dilemma; sectionalism

Author: Zhang Jun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contemporary China literature. Email: yugong01@126.com

近五六年来,因“新文学”报刊研究流波所及,一直被认为“文学”素质不高的当代文学报刊(1949—1976)也渐受关注,如《人民文学》、《文艺报》、《诗刊》等“国家级”刊物。这是可喜的拓展。不过,这些个案研究一则亟待扩大“覆盖面”,二则受到启蒙主义研究模式“很大的妨碍”(赵园等8),总是热心并满足于讲述一个个大同小异的党与“文学上持不同政见者”的故事。后一种局限性,使当前当代报刊研究难以原生态地呈现“新

的人民的文艺”与各种“异质成分”相互竞逐“谈判”并最终一统于“无产阶级文艺”的多层次史实。事实上,报刊之于当代文学,不仅是不同文学成分、话语力量相互竞争的被动场所,而且报刊自身的运作体制亦强烈地介入了这种“竞争”,对文艺界利益格局的重组、文学“潮流”的转移、叙事“成规”的形成都产生了影响。那么,有哪些报刊体制深深介入了当代文学的发生及发展呢?至少有三:(1)社会主义所有制;(2)代理人制度;

(3) 派系主义运作方法。这三层体制都与新中国单位制度紧密相关。

一、报刊所有制变迁与文学力量的重组

报刊体制之于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其为社会主义所有的“单位”属性。对此,中国共产党在接手政权之前有清晰考虑。1948年11月,中共中央指示:“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集团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中央档案馆 413),明确将刊物列为必须予以控管的意识形态机构。1949年,全国通过军管会重新登记并获得营业资格的报刊共计200余种,但其中绝大多数是科技类刊物,与意识形态有关的私营新闻报纸和文艺杂志十去其九,仅有10余种。随后一大批由中央和各地方文协创办的文艺刊物纷纷出现,1949—1976年间总计达160余种,随社会主义报纸而附设的文艺副刊数量更达千种左右。无疑,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报刊领导地位的有计划确立,彻底逆转了各种类型文艺刊物之间的力量格局,也使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了前所未有之变局。所谓“变局”,系相对于1940年代末期文艺格局而言。当时,文艺界呈现为新、旧文学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而“新文学”内部左翼、右翼又分治并存、互补相持的基本格局。在此过程中,鸳鸯派逐渐吸纳了“新文学”的因素,而“新文学”也慢慢承认了“旧文学”于世相摹写、人心刻画方面的高度成就。“新文学”中的左、右两翼则一直论战不断。其中右翼文学以讲述人性的保守主义故事而获得官方或明或暗的支持,左翼文学屡遭查缉但以其正义诉求而赢得更广泛的读者认同。不过,双方在某种意义上又互为“镜子”,对左翼避免过度的“集团主义”,对右翼避免过度脱离现实疾苦,毋宁都极有裨益。这种相互竞争又相互承认、吸纳的文坛大局,对文学内部多样性、异质性的生成,对其在自我否定的张力中获取提升资源的发展模式,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这种新/旧、左/右相对均势、彼此制衡的大格局,被新体制彻底逆转。这表现在,经过1949年重新“洗牌”,原本偏居一隅、为左翼之一脉的延安文学有如从空而降,突然变成了文艺界意气风发的主宰者——机关刊物济济一堂,个个庄严堂皇,而经审查获准营业的10余种同人刊物

不免势单形只,被挤到文坛边缘。截至1951年底,全国共有文学杂志约109种,其中机关刊物约90种,私营同人刊物19种。后者之中,左翼传统9种,右翼1种(即复刊后的《观察》),鸳鸯蝴蝶派3种。公私报刊力量之悬殊,十分明显。至1952年底,19种私营同人刊物悉数停刊(仅《观察》被改组为《新观察》)。当然,并非1949—1952年间所有私营报刊的停刊都是新体制直接导致的,譬如解放前夕不少上海小报即已由于经营困难而主动停刊,解放后重新登记发行的部分私营报刊(如复刊以后的《观察》)也面临销量低迷、难以为继的窘况。与之类似,1951年前后许多私营书局也出现了“陷于困境”,“纷纷要求贷款或国家投资实行公私合营”(胡序介 69)。但显然,读者不愿购买私营报刊与它们难以获得体制声誉有直接关系(见后文分析)。更重要的是,这些报刊的退出,减少了新体制挤压“残余”私营报刊的阻力。实际上,在机关刊物君临以后,当年延安以外的文学,无论新/旧、左/右实际上一并沦为了被逐渐剔出文坛的“旧文学”。而所谓“当代文学”,就发生在这破“旧”立“新”的过程之中。

这种“被剔出”的遭遇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必然。就机关刊物而言,它们由国家投资,由“可靠的共产党人”负责,被安排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阵地,被要求以《讲话》为唯一方向。可以说,在新环境下“复制”、发展延安文学是机关刊物的主旨。它们对“老解放区文艺”以外的文学缺乏兴趣甚至排斥可想而知。比如一度引领读者的鸳鸯文人,就完全丧失了机关刊物露脸的机会。丁玲对这类文人“没有出路”、“不能生存下去”(“在前进的道路上” 27)的警告,一天天地变成了现实。至于“新文学”中的右翼自由主义作家,因多系和前政权有所瓜葛的“体制内作家”,甚至曾经“勘乱”延安文学(如朱光潜等),同样难以登上机关刊物的版面。这两类作家在刊物重新“洗牌”后,基本丧失发表阵地,逐渐被“遗忘”。相对而言,左翼情形似乎乐观得多,毕竟左翼文人多系革命“同路人”(甚至地下党员)。不过即便如此,机关刊物也未必真正看重。郭沫若、茅盾等作为“典范人物”被公开优待并不等于对“鲁迅方向”念念难舍的“胡风派”不被排斥。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否“同路”,左翼文人都被要求告别“旧轨”,以汇入“新的人民的文艺”。

不过,在机关刊物上被区分、排斥并不意味着延安以外的其他新/旧、左/右文学传统在建国初年新的刊物格局中完全丧失地盘。毕竟,由于政权声誉的考量和“统一战线”的事实因缘,新中国并未公开宣布同人刊物非法,亦未完全如列宁所言“一取得政权,就要封闭资产阶级报刊”(“关于”267)。事实上,经过各城市军管会重新登记,仍有少量私营同人刊物得以复刊或创刊,而《大公报》、《新民报》、《文汇报》三家私营报纸的文艺副刊即因为中共中央团结中间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策而继续存在。在这些报刊中,与“新的人民的文艺”多有差异的“异质”文学传统依旧在运作,甚至与“延安化”格格不入。其中有与自由主义渊源甚深的《观察》杂志,有夏衍为安置上海鸳鸯作家而专门批准创办的《大报》和《亦报》,亦有走“鸳鸯路线”的《青春电影》,而承续左翼传统的刊物甚至略有规模,如《文艺生活》(广州,司马文森主编)、《小说》(上海,靳以主编)、《文艺复兴》(上海,郑振铎主编)、《大众诗歌》(北京,沙鸥主编)、《人民诗歌》(上海,吴越、劳辛主编)、《文艺劳动》(北京,严辰、苏金伞等编)、《起点》(上海,梅志主编),等等。此外,《文汇报》“笔会”副刊,《大公报》“文艺周刊”、《新民报》“萌芽”副刊、《新民晚报》“文艺批评”副刊,与新/旧、左/右关系其实都很密切。这10余种非社会主义所有制刊物其实走着两条路子:一是放弃旧的风格与文学诉求,自我调整,努力将自己归化到“新的人民的文艺”之中,如《大众诗歌》、《文艺生活》、《观察》等;一是力图坚持延续旧传统,如《大报》、《亦报》、《小说》、《起点》等刊物及几家私营报纸文学副刊。前者勉为其难,基本未见成效。如《大众诗歌》趋附大众化、政治化,《观察》“无法继承其以前的抨击时弊的风格,变成了以宣传为主的杂志”(储望华10)。后一类刊物则扎实有力,甚至颇见成绩。如《小说》月刊不但刊出了《饥荒》(老舍)、《开不败的花朵》(马加)等优秀小说,且以沉稳方式承续了“新文学”作风,譬如在编辑中对生活形象化、故事现实性、细节可靠性等“文学”质素的强调,相反,对与“毛主席的文艺方向”有关的本质、规律等概念则很少提及。《大报》、《亦报》亦因刊载丰子恺、周作人、张爱玲作品而颇受欢迎。这些作品在1949—1951年间实际上构成了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有效竞争。

《文汇报》、《大公报》等报纸副刊甚至有意识地展开“竞争”。譬如《文汇报》刊文批评主流的延安化批评“大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不该有的‘偏向’”,“暴露出其本质的——空虚和脆弱”(罗石7)。《大公报》、《新民报》也参与“纠正”。如《大公报》1951年4月7日主动抛出一篇署名“沙土”的粗暴批评,然后又接连刊发两篇文章,一是康捷的《〈评〈关连长〉〉读后》,一是陈允毫等集体署名的《写批评要慎重》,对沙土的概念化批评大加讽刺。而《大公报》在“编者按语”中也直言不讳地批评沙土“粗暴鲁莽、夸大缺点错误”。与此相呼应,《新民报》晚刊也于4月18日刊出钟子芝文章,尖锐斥责沙土“没有欣赏艺术的修养”。“没有欣赏艺术的修养”反映了前国统区文人对延安式批评的普遍观感。这无疑是当时迅速扩张中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所遭遇的不太“和谐”的声音。于此可见,建国初年的“当代文学”毋宁是芜杂的,既充满着建构的大气,又充斥着摩擦、挑战与不“驯服”。

然而,这种充满张力的相互竞争状态在新体制中未能持久。建国初年,实现“耕者有其田”和国家独立的中国共产党获得巨大声誉,各机关刊物也由于分享这种意识形态资源而赢得巨大影响力。当时刊物主编们对于刊物订数恐怕会有做梦般的不真实感——随便一份刊物都会销到10万、20万甚至30万份。而私营同人刊物的声誉却迅速“耗损”。如在40年代曾一度达到10万份销量的《观察》杂志,复刊后仅有三千订户。对此,王鹏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读者主要阅读《人民日报》等几份中共机关报刊”,“‘民营’报纸,不被读者重视”(60)。而且同人刊物与机关刊物在意识形态权威指数上的巨大落差,又转化为两类刊物在批评上的不平衡关系。当年新、旧文学相安无事,左、右两翼相互指责,但建国以后,这种格局就演变为机关刊物对同人刊物单向度的批评和责问。如《文艺报》先后批评过《小说》、《大众诗歌》、《文艺生活》、《新民报》、《大公报》和《文汇报》,而糟糕的是,普通读者又“把它看成判决书,人挨了批评就没有前途,书挨了批评就停止发售”(杨文斌9)。这些因素导致同人刊物先后主动或被动地停刊。

可以说,中共中央对报刊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设计与实践,从根本上重构了文坛生态,使现代文

学的“多重声音”逐渐向当代文学相对单一的格局转化。尤其是社会主义体制下“无形资产”的重组,更使延安文艺在数量上、声望上进而在作者、读者、评论上全面压倒同人刊物,并为之划上句号。新旧并存、左右相持的现代文学就此终结,而“新的人民的文艺”也由此“一统天下”并事实上进入繁盛状态。不过,因为“新的人民”(农民、工人)的凸显,乡村通俗文艺(曲艺)等亦得以跻身“文学”行列,使当代文学的内在构成发生变化。

二、代理人困境与文学的有限竞争状态

截至1952年初,“异质”文学阵地基本消失,机关刊物可说已垄断所有文学资源,旧作家要么被收编,要么放弃写作。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左翼、右翼、鸳鸯等“旧传统”彻底绝灭了?其实不然。这要涉及当代报刊体制的另一重常为人“遗忘”的因素——代理人制度。这是新体制的难言之隐。今日研究者常以“党的文学”指代当时文学的意识形态特征,但究其实,“党的文学”不过是抽象概念,作者、读者和批评家具体面对的,仍然是一份份具体的刊物。虽然“文学应该成为党的文学”并由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列宁,“党的组织”25),但这些人真的可靠么,或者说,现实中真有列宁所期望的“齿轮”或“螺丝钉”一类人物么?据笔者接触的材料,当年报刊负责人中除《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限1956年前)、《诗刊》主编臧克家外,其他人(如艾青、丁玲、冯雪峰、刘雪苇、秦兆阳、张光年、靳以、石天河、戈扬、王若望等)都绝非“螺丝钉”所能概括。他们经历既异,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又参差不同,对《讲话》的认识亦不尽一致。他们实是党在刊物中的“代理人”。这意味着,尽管各机关刊物对“新的人民的文艺”均表认同,承认体制“约定”的边界,但各负责人完全有条件将对《讲话》的不同理解甚至与《讲话》相去甚远的种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利益带进刊物。因此,“一体化”的当代文学在共同的“新的人民的文艺”面目下必然呈现出诸多纷异甚至冲突的“风景”:一方面,“新的人民的文艺”在竭力排斥、驱逐或“整编”各种“异质成分”,另一方面,这些“异质成分”又在其内部复活、再生乃至卷土重来。此种“旧传统”的因代理

而致再生/寄生并造成体制内部有限竞争的状态,在1952年后的文学报刊中计有四种表现。

其一,自由主义“成分”被小面积地“代理”进国营文学报刊。1952年后,出于统战考虑,中共中央仍将几家报纸交由“旧知识分子”主编,如《文汇报》短暂停刊后由徐铸成再度复刊,而《光明日报》作为民盟机关报,虽系国营但也主要由“旧知识分子”掌握。相对而言,《新观察》主编戈扬本是党员,但她过去与自由主义知识界交往颇频,所以前自由主义者(如费孝通)实对《新观察》的“编辑哲学”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些便利条件为自由主义被“代理”进这些报刊提供了可能。在1953—1957年间,《新观察》对新政权在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方面的尖锐质疑(如刊发《江村经济》、《北京大学是不是在闹事》等文章)是自由主义最激烈的挑战。文学方面,知识分子本位诉求也有明显表现。譬如《光明日报》“文艺生活”周刊争取“劳动知识分子”的重新命名,《文汇报》“笔会”副刊对《讲话》的“政治标准第一”的创作“成规”屡示不满。“有些作家已经不是从丰富的生活内容出发,观察、研究、创造出鲜明的形象来,而是从抽象化了的政策条文出发,把它变成一种框框,用来观察表现生活”(“反对曲解”2)。《新观察》还以“双簧”形式论证杂文的合法性。这些报刊的根基是有着“盛世遗民”(徐铸成语)之慨的前自由主义群体。其二,是左翼文学传统被大面积“代理”进党的报刊。本来,作为“新的人民的文艺”样板的“老解放区文艺”即从左翼文艺分蘖而来。这使左翼文艺不同于“新的人民的文艺”的重要特质——强调“揭出病苦”,反对思想改造,并不真正热心“普及”——进入党的报刊几乎“顺理成章”。冯雪峰在《文艺报》组织“新英雄人物讨论”,批评当时流行的“英雄人物”多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提倡写新人新事,却又拼命反对写矛盾和斗争”,“是在真理面前犯了罪”(李晴31)。刘雪苇在《文艺月报》不允许将“工农兵”列为读者对象,“指斥一定要把工人放在学生教师以前的主张为‘形式主义’”,当时即有编辑为此深感忧虑(《文艺月报》编辑部175)。而年轻一些的秦兆阳、黄秋耘以及《星星》编辑部、“探求者”同人团体“不管是通过苏联的渠道,还是通过自己先辈的著作”,“还是继承了‘五四’时代的传统”(费正清等270)。不过与费孝通等自

由主义者不同,这些代理人又多系“革命之子”,对新政权高度认同,只是在文学领域希望于《讲话》之外寻求更多文学资源,以使“新的人民的文艺”在政治性与艺术性之间达成更佳平衡。因此,1953年后(尤其“鸣放”期间),《人民文学》、《文艺报》、《文艺学习》、《北京文艺》、《星星》、《蜜蜂》、《东海》、《文艺月报》等刊物纷纷提倡“干预”,重新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有效性,酿成浩大“革新”潮流。如《人民文学》刊文批评本质化叙事想象:“例如,既然他是贫农(或是党员等等),那末,他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定很积极;既然他是先进生产者,那么他一天到晚除了机器以外一定什么也不注意”(樊骏4)。《星星》则“故意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工农兵方向,而代之以‘现实主义’和‘人民’字样”(流沙河367)。这种种调校,实是“代理人”(主编)重新引入左翼资源、力图激活逐渐板结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集体努力。其三,鸳鸯文学“成分”被小范围“代理”进国营报刊。1952年后,言情、武侠等鸳鸯主要文学类型已彻底丧失阵地,但旧式趣味浓厚的徐铸成仍把“笔会”副刊变成了鸳鸯“旧文人”的主要聚集之地,如陈慎言在该刊上开辟“北京俗话”专栏,范烟桥开辟“苏州的桥”专栏。这些“趣味”笔墨既有地方“风物”,更多文人“不问人世纷纭”、“谈诗悟禅”的旧式情怀。其四,古典文学“成分”被“代理”进党的报刊。如“笔会”副刊“东风”副刊(《光明日报》)大量编发旧体诗词、小品、笔记等“文人文章”,其间情怀往往不是“新的人民的文艺”所强调的未来感和乐观主义。如施蛰存吊鲁迅诗“感旧不胜情。触物有余悼。朝阳在林薄。千秋励寒操”,以物寄情,深有“物伤其类”之痛。又如刘大杰《北望》诗曰:“休言文章事,能追骥尾乎?”表达的是对自己被新政权“遗落”的不平与落寞,有着“旧知识分子”难以名状的心境。《光明日报》“文艺周刊”甚至批评新诗“基本上是从外国诗(特别是英国诗)借来音律形式的”,“在我们人民中间就没有‘根’”(朱光潜3),并提倡“建立新格律”,为“旧诗”争夺文学史地位与现实资源。

以上四种旧传统或“异质成分”,实皆“代理”的产物,它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内部并与之形成了竞争、依附和寄生的关系。不过,这还不是“代理人问题”的全部表现。其实,“新的人民的

文艺”怎样从“老解放区文艺”脱胎而出、铸炼出新的文学“正统”,或许更为重要。在此,学界存在长期误解,即将“解放区文艺”混同于“延安文艺”。其实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并非只有延安,全国共有较大根据地20余个。由于战争分割,除了延安进行过严格的整风运动外,其他根据地就主要是传达和学习。所以延安之外的革命文人对《讲话》的认同程度,对延安文人的“服气”程度,实在都成问题。在此情形下,非延安出身的作家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设计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就几乎是必然的。他们无疑会把一些相对于延安的“外省经验”“代理”进刊物。这也有三种情形。其一,华东版“新的人民的文艺”。出身新四军/华东野战军的文人们未经严格整风、“抢救”,对《讲话》口服而未必心以为然,建国后也缺乏唯周扬等马首是瞻的“意识”,所以他们主编的刊物多有“我行我素”之风。如“觉得行政职务太小”决定通过办刊物“自找出路”(王淑明3)的王淑明在《光明日报》上办起“文学评论”双周刊,屡屡“重磅”批评丁玲、赵树理,一时令人侧目。而由华东文人编辑的南京文联刊物《文艺》在“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已被宣布为新中国的“唯一的方向”后,依然对《讲话》视若无睹,高调谈论“坚持列宁的文艺原则”,认为“研究列宁有关文艺的启示,会使我们获得新的精神武装”(农菲4)。与此同时,《文艺》还特别热衷讲述毛泽东所反对的“抽象的人性”,尤喜欢将革命放到人性“炼炉”上去“煎熬”,譬如《恩情》(以母杀子)、《兄弟》(以弟杀兄)甚至《柳堡的故事》屡屡将革命置于破坏人性、反伦理的位置。其二,冀中版“新的人民的文艺”。冀中作家或许更“准确”地理解了《讲话》,他们主编的刊物(如《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欢迎有生活、有感受,手法通俗,主题明朗,切切实实的文艺作品”(孙犁97),而不追求《文艺报》孜孜念之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只是老老实实与习作者讨论怎样观察,怎样描写,怎样遣词造句以及怎样造成“风格”等技术话题,所刊作品也多是“一个小小故事,一个小小女性情感的激动”(萧来4)。其三,晋西南版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出身此地的赵树理、王春、苗培时、章容等作家与主流延安文人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理解几乎背道而驰。赵树理极为认同《讲话》关于“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的论述,而冯雪峰、丁

玲、艾青等其实不太以为然(冯通过《文艺报》暗中破坏了毛泽东1951年关于刊物通俗化的要求),赵树理对《讲话》本质化要求缺乏认识而“本质”、“规律”等概念正是《文艺报》整饬话语秩序的“利器”。这些差异使《说说唱唱》及《工人日报》、《新民报》文学副刊上的“新的人民的文艺”与多数党的刊物都不甚“搭界”,而更多地包含着农民审美经验自身的“文学”价值及其现代化转型。

以上三种不同“版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兼之前述四种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内部复活或寄生的旧“成分”,都可说是由于代理人制度而产生的当代文学内部的差异性。这些倾向所代表的刊物和作品,几占当时文坛半壁江山。这使当代文学在所谓“一体”的内部事实上纠结、涌动着不同的文学成分和话语方式,甚至埋下了众多流派“萌芽”的可能。这意味着,尽管存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管控,但难以摆脱的“代理人困境”依然可以使这种种“成分”并存相持,并以有限的竞争造就当代文学“万物花开”的景象。然而,这种可能并未变成充分的事实。何以如此呢?这涉及报刊体制中第三重隐而不彰的因素——派系主义。

三、派系主义与文学的意识形态衰变

当代文学研究者每每遗憾于甚至愤然于毛泽东对文学的强力介入。的确,由现象看,当代文学从初创期(1949—1952)的“芜杂”,到发展期(1953—1957)的内部“竞争”,到60年代以后的偏枯、萧条,毛泽东“左”的失误的确负有绝对责任,但这般考虑真的穷尽了当代文学全部的内在“病症”吗?其实不然,其间实亦有知识阶层自身的责任。不必讳言,当时许多报刊负责人(如丁玲、冯雪峰、唐弢、张光年、陈企霞、康濯、刘雪苇、施燕平、袁水拍甚至邵荃麟、王淑明、石天河等)实皆派系中人,只不过由于“知识分子”一词在不少研究者思维中已和“受害者”、“幸存者”等概念同一化,而他们可能同时是“挟私报复者”、“任人唯私者”、“排斥异己者”的事实就往往被无意识“遗忘”。然而恰如1954年胡风的忧患之言——报刊已陷入“一层又一层的小领袖主义”、“有力的作家们进行了对于这些刊物的争夺战”(355)。此类“争夺战”背后的派系主义对当代文学的发

展其实造成了莫大损害。可以上海《文艺月报》对“胡风派”的围剿为例分析。

1953年6月,《文艺月报》副主编唐弢在编委会上提出要刊发两篇批评耿庸《〈阿Q正传〉研究》的文章,理由是“论点很有问题,并对雪峰作了无原则的谩骂”(夏衍136)。此说初看颇为严正。的确,耿庸批评了冯雪峰在瞿秋白两期论基础上发展出的完整的“鲁迅论”。耿庸(包括胡风、王元化等)认为,冯的鲁迅研究暗含一个问题:即承认鲁迅经过了《讲话》所要求的“思想改造”,无形中利用鲁迅证实了《讲话》的正确,而这被胡风等视作对鲁迅的背叛。不过对此层用意,耿庸并未在书里写出。书中正面论证的,主要是鲁迅从一开始即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此说不免怪异,但胡风、耿庸既欲取消有关鲁迅“变化”(改造)的论点,又不能否认鲁迅最后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权威结论,就只能让鲁迅提前“成熟”。单从理论上讲,耿庸的论点的确“很有问题”,但这是否意味着应该予以公开批评呢?冯雪峰本人就未公开回击。因为同为“鲁迅弟子”,冯雪峰对耿庸以及耿庸背后的胡风派不免惺惺相惜。倘若一加反驳,抓住耿庸的理论“软肋”不难,但势必会将耿庸隐藏着的对抗《讲话》的真实想法“曝光”。然而唐弢选择了批评。那么,唐弢此举真的出于对于“真理”的热爱吗?非也,其实很大程度上出于报复。据唐弢自述,1952年他编印《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刘雪苇“授意罗洛执笔”,批评该书说明前后不符,断定态度“不严肃”,不应该“胡乱出版”,结果导致新华书店拒绝进货(唐弢45)。而在40年代,他与耿庸更有过难以释怀的笔墨“官司”。这些意气纷争使唐弢选择了报复。这引起了唐弢与上海胡风派的矛盾。在夏衍强力支持下,唐弢不但刊出两篇批判文章,而且还将刘雪苇被清理出了《文艺月报》编委会。不久后,又解除了他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一职。唐弢彻底执掌《文艺月报》大权后,更进一步发动了对“胡风派”的围剿(“胡风派”反批评则无法刊出)。这些“围剿”文章与其说在论理析文,不如说在网罗罪名。由上述事件可见:一,唐弢本人以撰“鲁迅风”杂文而知名,对意识形态应该不是太信从,但为了“击垮”私敌,他不惜以《讲话》为工具,以《文艺报》式的意识形态批评,利用《文艺月报》向耿庸、阿垅、冀汭等“胡风派”发起

“猛攻”；二，唐弢没有受到任何压力需要发表这些文章，相反，他是排除阻力（刘雪苇、彭柏山等）发表了这些罗织罪名的文章。派系恩怨在此导致了可怕而危险的后果——它主动引导政治逻辑“侵犯”文学事业，几如“引狼入室”。

遗憾的是，在当年报刊负责人中，类似“复杂”人物比较普遍。作为作家或评论家，这些文人都有独到造诣，但作为主编他们往往又以派系利益作为行动准则。丁玲主编《文艺报》期间曾屡屡点名和不点名地批评“周扬的人”（夏衍、赵树理等）。那些批评大都借用《讲话》名义，但其动力却往往在于“胡（乔木）、周（扬）之争”中的权力收益。这种派系主义批评对赵树理的通俗化实践构成了严重破坏。而“周扬派”人物张光年接任《文艺报》主编后，又反过来刊发批评丁玲的稿子。1959年，郭小川不愿再追随周扬党同伐异，《文艺报》就出现了批判《望星空》的文章。在此过程中，《文艺报》、政治意识形态实皆沦为派争工具。遗憾的是，此类情形尚可大规模地开列。譬如，王淑明在《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上对《桑乾河上》的批评，陈企霞在《文艺报》对裘祖英的批评，罗石在《文汇报》“文学界”副刊上对夏衍的批评，张禹在《文艺报》上对夏衍的批评，唐挚在《文艺报》上对周扬的商榷，邓友梅等在《文艺报》上对《说说唱唱》不依不饶的批评，候金镜在《文艺报》上对路翎小说的批评，《人民日报》对丁玲、冯雪峰乃至夏衍、周扬的批判，《朝霞》和1976年复刊以后的《人民文学》上的多数评论文章。这些批评，当然有文学论辩自身的因由，但在不同程度上与人事恩怨、门户意气甚至政治斗争都存在说不清楚的关联。而为获得政治/道德“制高点”，这些批评总是把《讲话》及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当做“用来争取其利益的话语‘弹药库’”（詹姆斯·卡伦 301），使文学底线屡屡被政治突破。此一特点，被海外研究者归纳为“强调意识形态”的“共同不变的模式”：“为了辩护自己的路线正确，不惜一头栽进‘马、列、毛’的原典或全集中，截取合乎自己所用的只字片语；亦即拿断章取义的教条来合理化自己的路线”（苏嘉宏 166-67）。应该说，这种做法历来被丁玲、张光年、张春桥、姚文元等不公开地奉为“不二法门”。他们以此待人，也被人以此待之。不难想象，此种行为模式必然危及当代文学内在的异质性和多层

性，引发其意识形态衰变。

不过，从理论上讲，当代文学报刊体制的派系主义之弊未必一定会导致文学沦陷于政治。一则人以类聚，利益、观念以及部属关系、师承关系、地缘关系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使派系分立之势在所难免，二则文学派系实际上也可表现为文学流派。譬如新文学历史上的意气之争、门户之见又何曾少呢？然而语丝社、创造社、新月社等并不被人贬为“派系”，而被视为有效地组织、提倡并实践了特定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的“流派”。那么，二者区别何在？丁玲“文革”以后痛定思痛地说：“从20年代就有宗派，当时是由共同志趣结成的小团体，这不是坏东西。但从什么时候‘宗派’成了可怕的坏东西了呢？恐怕是手里有了权，再搞宗派主义，就会达到可怕的程度”（“讲一点”733）。可见，流派一旦与政治权力结盟，就会产生派系（宗派），而建国以后大量文人正好掌握了体制权力。而且，派系斗争若欲取得胜利，还须与高层阶权力持有人营造私人关系。因此，道德水准较低的人取得成功的概率更大，“劣币驱逐良币”遂成不易之则。这种权力斗争机制可谓不祥之兆。它表现在：一，在1949—1976年间围绕报刊的“有力的作家们”的“争夺战”中，所发生的主编权更替几乎全部是“劣币驱逐良币”。譬如，《人民文学》最初党内负责人艾青本属吟酒啸歌之徒，对政治不太上心，但在1952年初他被需要扩大“地盘”的胡乔木安排丁玲取代，又如对《讲话》暗持“不同意见”的冯雪峰1954年底因“小人物事件”被毛泽东借故“整顿”，于是周扬安排长期趋随自己的张光年和“勇”于揭发丁玲的康濯入主《文艺报》。诸如此类的人事变更，必然带来报刊“文学”质素的劣化。而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中间及以后，作为对仕途往往有所热衷的“劣币”，新负责人多会使用派争中的“意识形态模式”，致使文学报刊逐渐被种类繁多的“本质”、“规律”、“共产主义”等概念所填充，并趋于“积极分子化”。如丁玲接手《人民文学》后，竟然在此国家级刊物上大量发表铁厂、棉纺厂、纱厂、解放军战士的习作，且推出了时事化的“三反、五反创作辑”、“志愿军诗特辑”、“世界诗人为和平而斗争”特辑。王亚平接手《说说唱唱》后，第一时间不点名地批评赵树理“在具体工作中缺乏或放弃了思想领导”（5），并大量选登配合政策的说唱作品。

李累接手《星星》后,就将之从“给学生看”的高端刊物下调为以“工农兵”为对象的政治刊物。

派系主义“潜规则”导致的当代文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不仅指刊物负责人的更迭,同时也会导致当代文学内部不同文学成分和话语力量之间的“驱逐”现象。历史地看,1949年后社会主义所有制逐渐挤压并最终“清空”私营同人刊物以后,左翼、右翼、鸳鸯等各种文学传统就丧失了“领地”。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文学“一体化”趋势。然而“代理人困境”的普遍存在,仍然使当代文学呈现为“一个被争夺的领域”(鲍尔德温等141),各种“异质成分”和不同版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一体化”表象之下彼此竞争、相互否定又相反相成,并形成生机勃勃的有限竞争局面(“百花文学”是其典型气象)。遗憾的是,由于派系主义“在中国就像美国的苹果馅饼那么普遍”(罗斯·特里尔176),兼之单位体制的“催化”作用,当代报刊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地“抹除”了其四处潜伏的摩擦、竞争和冲突,而在“强调意识形态”的“共同不变的模式”(苏嘉宏166-67)的驱使下,日渐消灭了当代文学内在的“芜杂”与张力,几乎是不可逆地将“新的人民的文艺”带向“无产阶级文艺”,甚至带向帮派文艺。这是当代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令人遗憾的内在“景观”。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Baldwin, Elaine, et al. *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 Trans. Tao Dongfeng, et al.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

中央档案馆“中央关于新解放区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4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

[Central Archives. “CCCPC’s Directives on the Press Agency in the Liberated Area.” *The Selected Documents of CCCPC*. Vol. 14. Beijing: Party School of CCCPC Press, 1987.]

储望华“秋之泣——怀念父亲储安平”,李菁整理《文史博览》12(2008):8-14。

[Chu, Wanghua. “Autumn Tears: In Memory of My Father Chu Anping.” Ed. Li Jing. *Culture and History Magazine* 12(2008):8-14.]

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史安斌、董关鹏译。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Curran, James. *Media and Power*. Trans. Shi Anbin and Dong Guanpeng.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丁玲“讲一点心里话”,《丁玲选集》第3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Ding, Ling. “Words from My Heart.” *Selected Works of Ding Ling*. Vol. 3.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ress, 1984.]

——:“在前进的道路上”,《丁玲文集》第6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 “On the Road to the Future.” *Selected Works of Ding Ling*. Vol. 6.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ress, 1984.]

《文艺月报》编辑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对《文艺月报》的进攻”,《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2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

[Editorial Board of *Literature Monthly*. “An Expose of the Attack to *Literary Monthly* from Hu Feng’s Counter-Revolutionary Group.” *A Resolute and Thorough Crush on Hu Feng’s Counter-Revolutionary Group*. Vol. 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5.]

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Fairbank, J. K,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5)*.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0.]

樊骏“既然……那么……”,《人民文学》7(1956):3-4。

[Fan, Jun. “Since. . . . Then.” *People’s Literature* 7(1956):3-4.]

胡风《胡风三十万言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Hu, Feng. *Hu Feng’s 300000-Word Letter*. Wuhan: Hu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胡序介:“回忆伯父在出版总署的工作”,《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5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

[Hu, Xujie. “Remembering My Uncle’s Work in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China’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Publication*. Vol. 5. Zhengzhou: Daxiang Publishing House, 1999.]

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Lenin. “The Party’s Organization and the Party’s Literature.” *Complete Works of Lenin*. Vol. 10.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9.]

——:“关于出版问题的发言”,《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 “A Talk on Publishing.” *Complete Works of Lenin*.

- Vol. 26.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9.]
- 李晴 “这是脱离生活的结果”，《文艺报》11、12（1952）：30-31。
- Li, Qing. “This Is the Result of Keeping Away from Life.” *Literature and Art Tabloid* 11,12（1952）：30-31.]
- 流沙河 “我的交代”，《逝川忆语——〈星星〉诗祸亲历记》附录。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
- Liu, Shahe. “My Confession.” *Remembering the Past: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Case of Star Poetry Magazine*. Hong Kong: Pegasus Books Ltd, 2010.]
- 罗石 “略谈我们的文艺批评”，《文汇报》1950年5月28日：7。
- Luo, Shi. “On Our Literary Criticism.” *Wen Hui Daily* 28 May（1950）：7.]
- 衣菲 “坚持列宁的文艺原则 树立新时代的文艺批评”，《文艺》2（1950）：4-6。
- Nong, Fei.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Lenin's Literary and Art, and Building up th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Literature and Art* 2（1950）：4-6.]
- “反对曲解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讲话”，《文汇报》1957年6月3日：2。
- “Opposing to the Distortion of Chairman Mao's Talk on Literature and Arts.” *Wen Hui Daily* 3 Jun（1957）：2.]
- 苏嘉宏 《派系模式与中共政治》。台北：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 Su, Jiahong. *Factionalism an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Taipei: Permanent and Culture Publishing Limited by Share Ltd, 1992.]
- 孙犁 “我和《文艺周刊》”，《孙犁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 Sun, Li. “Literary Magazine and Me.” *Complete Works of Sun L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4.]
- 唐弢 “我所接触的胡风及其骨干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文艺月报》7（1955）：42-46。
- Tang, Tao. “My Encounters with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Hu Feng and the Key Members in His Gang.” *Literature and Art Monthly* 7（1955）：42-46.]
- 罗斯·特里尔 《江青正传》，张宁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 [Terrill, Ross. *Madame Mao: The White Boned Demon*. Trans. Zhang Ning, et al. Beijing: World Knowledge Press, 1992.]
- 王鹏 “建国初《大公报》的一段曲折”，《炎黄春秋》8（2005）：56-60。
- Wang, Peng. “A Hidden Case about *Ta Kung Pao* at the Beginning of New China.”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8（2005）：56-60.]
- 王淑明 “从《文学评论》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文艺批评思想”，《人民日报》1952年1月10日：3。
- Wang, Shuming. “A Reflection on My Concept of Literary Criticism Based on My Editorial Work for *Literary Criticism*.” *People's Daily* 10 Jan（1952）：3.]
- 王亚平 “为彻底改正通俗文艺工作中的错误而奋斗”，《说说唱唱》6（1951）：5-8。
- Wang, Yaping. “Striving for a Complete Correction of Mistakes in the Popular Literature Work.” *Talking and Singing* 6（1951）：5-8.]
- 杨文斌 “一个编辑的意见”，《文艺月报》8（1956）：7-9。
- Yang, Wenbin. “An Editor's Opinion.” *Literature and Art Monthly* 8（1956）：7-9.]
- 萧来 “《芦花荡》”，《天津日报》1949年10月15日：4。
- Xiao, Lai. “On *Reed-Flower Lake*.” *Tianjin Daily* 15 Oct（1949）：4.]
- 夏衍 《夏衍全集》第16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 Xia, Yan. *Complete Works of Xia Yan*. Vol. 16.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5.]
- 赵园等 “20世纪40—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2004）：1-37。
- Zhao, Yuan, et al. “Problems and Method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1940s-70s.”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Research Series* 2（2004）：1-37.]
- 朱光潜 “新诗从旧诗能学习得些什么”，《光明日报》1956年11月24日：3。
- Zhu, Guangqian. “What the New Poetry Can Learn from the Old Poetry?” *Guangming Daily* 24 Nov（1956）：3.]
- （责任编辑：王 峰）